

文化快评

囤积知识只是学习第一步

石聆

微信收藏的未读文章数数百篇,下载的书籍和电影迟迟未看,手机、电脑的内存频频告急。有人说:互联网时代,不少人养成了一种“囤积癖”,在网上下载大量资料却常常“存而不阅”,想清理却又无从下手。

日子好过了,囤积生活用品的人少了,但“囤积信息”的人多了,理由也更充分了。看过的电影、照过的相片如同“备忘录”,记录着美好的记忆,弃之可惜;没读的书、没看的帖偶遇就是缘分,如果不马上保存,就会在信息洪流中销声匿迹。囤积信息几乎不占用物理空间,不会和生活起居“抢地盘”。存储介质由1.44Mb的3.5英寸软盘扩大到空间以Gb、Tb计的硬盘、网盘,信息获取渠道从实体书报群租网站,我们赶上了“攒资料”最便捷的时代。

信息爆炸,意味着信息量大、信息迭代快;所幸,信息的存储、传输能力也更强。但除了“量变”的视角外,人们更关注信息存储方式的改变是否带来了“质变”。有人说:信息囤积,使人们从知识的生产者成为知识的搬运工。有人说:只存不看,人变懒了,大脑也退化了。这些说法似乎有些道理。尤其当集纳成为一种影响生活工作的习惯,当放弃无用的物品成为一种障碍,从心理学的角度看,有可能已经患上了心理疾病。

但从学习的角度看,信息积累是现代社会的必修课。在学科分工细化、知识快速迭代的当下,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几无可能。即便专攻一门,也没有谁能掌握必备的所有专业技能。老一辈学者常常通过成千上万张手写卡片积累知识;在电脑辅助人脑“记忆”的时,“知道信息在哪里”与“知道信息是什么”同样重要。所以,把信息囤积到手机、电脑中的“私人图书馆”,利用技术编入库、检索查询、精准定位所需知识,日益成为公认的学习方式。尤其就自己关注的领域而言,在“把书读薄”之前,先要下一番占有资料、“把书读厚”的功夫。

然而,囤积信息不应是搬运,而应是对知识的第一道加工。在知识的位阶中,比具体信息、学问更重要的是思维、智慧。这种更重要的知识,被中国先贤刻画为“闻见之知”以外的“德性之知”;在一些外国哲学家心中,则是比归纳总结更重要的“强调新细节的新模式”。如果说知识的记忆与检索可以委托给电脑和网络,但学习却不能完全依靠机器代劳。看待世界的方式,修身养性的智慧,独立思考的能力,动态提升的思维,都要靠日复一日的磨练,非囤积之力所能获得。学思互鉴、知行合一的深度学习方法也未尝改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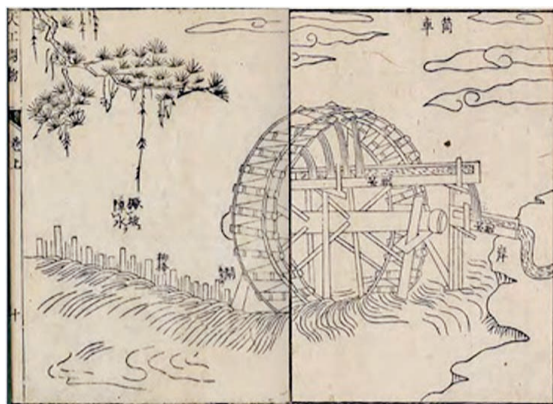
人们提防信息“囤积癖”,一方面是担心信息过剩,不复有几十年前借书、租书的学习热情,甚至由只存不用演变成拖延症,由随性而学发展成压根儿不学;另一方面,则是害怕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中只会粘贴不会创作,只会“捡到筐里都是菜”不会“挑选整理取舍”,逐渐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。这种担心不无道理。毕竟,学习既是手段又是目的,但囤积只是手段不是目的。莫要为了将来的积累而错过当下,否则,占有资料的满足感和缺乏知识的恐慌感,只有一步之遥。

株洲风物

从“筒车唧挽水”说起

醴陵旧时田园风光素描

丁水生



“筒车唧挽水,唧唧唧唧”(书面语为“吱吱吱吱”)……

这两句醴陵人耳熟能详的童谣,你必须用地道的本土方言去读,才能品出它的韵味,品出它的幽默。第一句中的这个“唧”,本身是个无意义的虚词,在醴陵方言中却大有用场:公唧、婆唧、仔唧、妹子唧、轻唧、一刻唧……听来给人一种极温柔、极舒服的感受,换一个字或抽掉这个字,读成公公、婆婆、仔子、妹子……就立刻显得干巴巴全无情趣。后面一句中间是这个“唧”,在此又被用为象声词,但醴陵方言使其成为第一、第三两个“唧”的读音转为“既”,如同广东话“吱”读成“机”,带有与粤语融合的某些痕迹。用醴陵方言连起来读,就变成了“唧唧唧唧”,简直就是车轮或门轴摩擦之声的再现!

它惟妙惟肖地表现出筒车转动的声音甚至形态,以及醴陵人对它亲切的喜爱之情。只要你熟悉它或者是见到过它,哼着这两句歌谣,它那苍劲有力、巨大威严、从容不迫地转动不停的身軀雄姿,立刻就能浮现于你的眼前。

远去的筒车

醴陵城南王家码头附近,曾有一架筒车。上年纪的醴陵人,或许还会记得甚至亲历过这一幅图景:盛夏黄昏,码头上嚷嚷拥挤着成群结队来游泳、洗澡的人。男人大多赤膊短裤,仿佛是在有意展示自己有力的躯干和发达的肌肉;细仔们则大多光着屁股,欢叫着追前赶后,只想一个“猛子”就“扑通、扑通”扎进河里去;古老码头连接着的一条石板街,被他们赤脚匆匆来往的大步踩得湿漉漉的,充满了灵气。有些媳妇和青年女子,白发苍老也受不住这水的诱惑,不脱衣裤就下了河,但他们一般都稳稳地并不游向江心,只是惬意地在近岸处由江流冲刷着自己的躯体。而在码头石阶和伸向河心的木跳板上,几个阿姨、大嫂或蹲或跪着棒槌,正在捣洗着一家人的衣物。间或有谁抬起头去擦一擦额前秀发,那眼光不是在寻找急流中的老公,就是担心着自己正在掉浪的孩子。看似随意的一瞥中,继续深情流露得真切而又微妙。

那架巨大的筒车,就矗立在码头上游不远处的河湾。从西山深处流下来的一条小河,哼着歌谣穿过“二圣桥”向着河湾扑来。一道木桩和卵石筑成的坝堰从这里横过江去,隔着状如洲头和河道另一边的水坝遥遥一线。三两处炊烟,正依依袅袅从对面东城大街临河那一幢幢吊脚楼飘逸出来。渌江之水,在把它抬高的坝堰面前显得是那么湍急,奔腾吼叫着漫过坝顶倾泻而下,或从年深月久、朽败歪仄的木桩缝隙中激溅而出;鱼儿却偏偏要跳“龙门”似的逆着急水往上游,一条一条在人脚背、胯下滑来又钻去;江水则清澈得让你可以数出河底沙滩上的卵石螺贝。一个被人视为“精怪”的“水鬼”,顺手从木桩底下,或水草中逮住一条鱼扔到岸上,引来一河的惊叹;河湾上游来了一艘满载煤炭的大货船,正扬帆高举从坝口航道急驶而下,“掌舵老大”如一棵松树镇在船尾,纹丝不动地稳稳扳住舵舵目视前方。船离坝不远,他就感觉尾舵似有摇摆,一扫眼

河中,却是几个“光屁股”的顽童扳着舵在玩水溜船的游戏!恼怒的船老大举篙正想驱赶,却又被孩子们调皮地逃离逗乐,并冲岸边什么地方打去一个漂亮的响哨,竟立刻引来一位正牵挂着孩子的母亲莞尔一笑。这一笑非同小可,船老大禁不住喉咙发痒,扯起山歌继续行船。快乐的歌声和这足以令人微醉的情笑,如夏夜傍晚初起的和风,在满河滩温馨地盈盈飘荡……

筒车仍在那里不紧不慢地转动着。水声哗哗,源源不断地倾泻向高架起的木槽和连接着它的水渠。河坡上去一大片田畴沃野,远处“马背岭”上高高的“起元塔”,已渐渐融入暮色;一阵一阵的蛙鼓此起彼伏,已收或待收割的水稻田里,散发出泥土、稻穗的混合之香。挨着码头的“白云观”,清晰传来庙里晚祷诵经时“袅袅”的木鱼敲击声,这暮鼓晨钟的城郊胜景,曾经是那么令人神往……

只是非常可惜,醴陵城区这最后一架筒车,大约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在人们一片呐喊声中轰然倒塌并被肢解拆卸。再后来,是错杂高耸的现代楼盘,挤兑了这江畔的城市空间,遮断了“起元塔”投来的深情瞭望。从此,再也听不到筒车对渌江河的浅斟低唱……

筒车的文化渊源

筒车又叫水车,以竹木为主编成巨大的轮轴,借水力冲击而施吸水灌溉之功。据史料载,唐代陈章甫曾作《水车赋》以记之。可见最迟在唐代,水车即已形成出现。自唐后期至宋朝,经济文化重心逐渐从中原向南方转移,特别是随着北宋金人入侵,宋室南渡,江南从此更成为朝廷财源来源地。这种情况大大推动了以灌溉、耕犁为主要支撑的南方稻作生产体系的发展,并以两宋时代水车空前繁荣发展为标志,形成蔚为大观的水车文化。当时许多重要的政治家、文学家、诗人如范仲淹、王安石、苏轼、张孝祥等等,都曾对此留下优秀诗篇。

醴陵农村水车始用于何时,已不见记载。据《民国醴陵县志》载:宋仁宗时,曾遣使从占城(今越南)购早稻种万石分给农民种植,至今仍俗称为“番子”。这是醴陵种植双季稻的开始。从上述两宋稻作体系形成,以及水车繁荣发展的背景分析,至少在南宋,筒车就已在醴陵得到普遍应用。范成大、杨万里、刘克庄等著名诗人,都曾从水路经醴陵过往,如范成大就有“渌水桥边县……”之句。说明在那时,渌江就是一条水量充沛并引起他们注意的河流,筒车早已被广泛利用。只是因为他们来去匆匆,未及为它写下诗篇。

幸运的是,清朝嘉庆年间,曾任醴陵县学训导的桂阳州人氏吴鲸,曾作《咏渌江筒车》诗一首,历来被人们注意和传诵,其诗如下:“渌江如油坝如堵,水车匝匝连村坞。一岁再获膏腴,醴人藉此丰积贮。机油转轮轮轴简,枝柯横贯相撑拄。团栾编竹作篷筒,后叶方沉前叶举。堵水草中逮住一条鱼扔到岸上,引来一河的惊叹;河湾上游来了一艘满载煤炭的大货船,正扬帆高举从坝口航道急驶而下,“掌舵老大”如一棵松树镇在船尾,纹丝不动地稳稳扳住舵舵目视前方。船离坝不远,他就感觉尾舵似有摇摆,一扫眼

然美丽岂甘心,措措文人终自苦。”

感谢乾隆时这位举人出身的吴鲸,在醴陵渌江书院孜孜训育人之余,还能这样细致入微地体察当地的农耕活动。“团栾编竹作篷筒,后叶方沉前叶举”“低时舀水筒半昂,高时泻水筒渐俯”,渌江筒车的构造,功用乃至器材使用,写得这样真切切见,绝不是抄着手臂踱步就能做到的。这需要一种艺术提炼的功力,更需要一种至爱关切的情怀。你看他开篇,“渌江如油”寥寥四字,不就写尽他和农民爱水如命的情感!这四个字使得后面“一部水乐声唧唧,万姓欢呼到儿女”的描写,尤其显得有力度和深度。这首诗能够成为醴陵农耕文化的典型象征,受到人们的喜爱而流传不衰,绝不是偶然的。

新时代的筒车精神

筒车在水利中的应用,可说是我们祖先对“敬天以顺时”和“天人合一”观念最完美的演绎。据《民国醴陵县志》载,当时在渌江及其支流上,共筑有坝堰652座,而耸立着的比这数量更多的水车的巍巍身影,却又无一不与周围环境相和谐、古人头脑中并没有“环保”“污染”等一类字眼,但他们的智慧创造,又无一不与水车赖以转动的(坝)岸之地理地势,江中之水流水速取得最大的统一。这是不选择中的精心布置,是不经意中的刻意安排。前述诗中有句“天然美丽岂甘心”,吴鲸老先生的赞美,可谓把先人对自然顺势而用的妙谛一语道尽!

醴陵的水车体系中,还有一个品种叫作“龙骨水车”,也即吴鲸在诗中提到的“足踏手磨田父”那一种。它以木质箱筒内装配状若长蛇以轮轴带动的节节叶片发力,比桔槔轻巧而又省人力用脚踏或用手摇。所以诗人最后说“措措文人终自苦”,流露出他对农民辛勤劳累的深切同情,读后令人怦然心动。

翻天覆地的时代巨变和工业文明的进步,使我们告别了古老而又沉重的筒车。而古代农耕文化中无论是工具、技术、耕作、节气、岁时、祭祀等等,也无一不在新的时代被赋予新的内容,既有继承发展,也有扬弃创新。在许多领域,我们都创造了无愧于先人的成就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醴陵清水江乡农民贺继生,就曾以制造“世界第一台插秧机”的光荣,使他在友好邻邦尼泊尔国王面前作过现场演示,并把他和国王及王室其他成员的合影,光荣地展示在县城照相馆那明亮的橱窗,令多少和他同辈的醴陵青年精神一振!后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,醴陵又涌现了“国际杰出稻农”瞿水寿;接下来九十年代全国“吨粮田”的建设中,醴陵更是第一个获得长江流域双季稻亩产过双千斤的殊荣。

古代农耕文化是一部内容丰富、不可穷尽的大书。本文只是以水车文化为其典型象征,描绘它在醴陵曾有过的或代表过的田园风光。所以时至今日仍然不会忘记水车。有人说:一个没有理想的民族,是没有希望的民族;同样地,一个没有记忆、不善于继承的民族,也应该是没有希望的民族。听说,在规划建设中的醴陵流溪潭城市新园区,将恢复重建起包括水车在内的某些传统农耕文化景观,这足以令人高兴而又充满期待。

株洲往事

花棚被淡忘的红色记忆

刘柏林

在茶陵东部的罗霄山区有一个小山村,村很小,从村头走到村尾不足一百米,二十几户人家,六七栋房屋挨在一起,屋连屋、户串户,雨天把每户走遍都不用打湿鞋,真正是“一家炒辣椒,全村打喷嚏”。就是这么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村庄,在那如火如荼的大革命时期,曾经发生过不少革命故事,留下许多红色记忆。

这个小山村有一个美丽的名字,叫花棚。据说取这个名字是因为“其山多野花,山路两侧,野花夹道如棚”。其实,这个名字的由来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。

传说很久以前,从江西来了一名猎户,手里牵着一只猎狗。猎户来到半山腰时,看到满山的野花,花藤拱起一个又一个花棚,美丽极了。看着这美丽的风景,猎户久久不愿离去,那只猎狗也趴在地下不想离开。后来,猎户便把全家人接到这里,安下家来,并将这里取名为花棚。

花棚村后来改名叫花木村,属尧水乡管辖。几条石板路贯穿整个村庄,前面的一条通向山外的尧水圩,右边的一条通往小田和江西的山区,左边的一条通往严塘圩。村民们就是沿着这些石板路上山到圩场赶圩,南下去广东担盐。至今,大部分石板路也已扩修成现代化的水泥路,或无人走动,损坏严重,只有村前那条通往山外的石板路一直保存完好。站在石板路的高坡处,可以纵览尧水方向的进山之路,高坡处还有当年的哨所遗址。小时候在哨所里躲过雨、躲过脚,那时总以为是村民建的哨所,用于观察兵匪进山情况的,现在才感受到这个哨所所承载的历史责任——村庄的后面是莽莽大山,可直达罗霄山脉中部的江西地界,人往山里一躲,有如一根针掉进大海,无处寻觅。前有哨所可防,后有大山可躲,这是搞革命活动最好的地方。

九十年前,革命浪潮风起云涌,据史料记载,尧水这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地方曾是茶陵农民运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。尹子斌、尹长年两个早期革命者在尧水圩成立尧市农民协会,临近的花棚村受其影响,也成立了农民协会和农民夜校。在尹长年和郭性化的组织下,花棚村的九墩建立了严尧地区第一个乡级苏维埃政府。1930年8月,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,茶陵县苏维埃政府迁到了花棚村,并在花棚村居留了8个月。1931年3月,县苏维埃政府

由花棚村迁到南岸村,4月迁往严塘湾里村,同年冬,又迁往陡上村,后再迁至花棚、猪头岭、寨下坪。

茶陵县苏维埃政府两次在花棚居留,期间发生的故事,已无从考证,但是,花棚村为这个政权做出的贡献是可想而知的。

1931年2月,中共湘东南特别委员会在花棚村设立了南路分委。南路分委在花棚村举办了短期干部训练班,谭余保、陈宗德、谭文邦等一大批革命干部在这里接受过训练。1934年,在茶陵苏区失陷、革命进入低潮的时期,国民党对苏区进行了重兵清剿,花棚村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。以恶霸刘珠焯为头子的尧水“铲共”义勇队,对尧水的苏区实行惨绝人寰的“杀光、烧光、抢光”政策,高喊“上山后石头也要砍三刀”口号,对花棚村进行了疯狂报复,一把大火把村庄烧个精光——小小的一个村子,竟有19名在册的革命烈士。

花棚村对面有一座山,叫将军山,介于严塘与尧水之间,山下有条石板路通往严塘圩。1931年3月,这座山上发生了一次激烈的战斗,这就是茶陵革命史上著名的将军山战斗。参加这次战斗的我方是红七军、红三团,由红七军军长张云逸统一指挥,敌方是国民党十九师一一一营。小时候,听老人们讲,当时战斗打得很激烈,我们问有多激烈,他们说跟电影里演的一样。据史料记载,这次战斗持续六个多小时,消灭敌军近一个团,这是红军进入湘赣边区的第一仗,也是主力红军与红色地方武装及苏区群众协同作战的典范。为支援红军作战,花棚村群众当向导、传情报、烧水做饭、抢救伤员,做出了积极的贡献。

由于花棚村地处半山腰中,地势陡峭,交通极为不便,而且随着人口的快速增加,当年的山泉水已不能满足更多人的饮用。四十年前开始,花棚村的住户逐渐搬迁到了山下,现在已无人居住。岁月流逝,除刘氏宗祠外,其他建筑物全部成为废墟,村庄已是一片荒凉。

站在废墟前,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花棚村和花棚人承载了茶陵革命重大的历史责任,做出过巨大牺牲,却没有留下任何历史遗迹,也不被众人知晓,只有刘氏宗祠和那些参天古树在默默见证。作为花棚村的后人,我要把这片红色历史永远珍藏在心里,激励自己走好每一步人生路。



花棚村前的这条石板路可通往尧水圩



搬到山脚下的花棚村,如今已更名为花木村



时移世易,曾经留下诸多红色记忆的花棚村如今也衰败不堪

